

既是史學史，也是學思歷程—— 讀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及《新史學圈外史學》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代史學的形成，有賴史家研究成果及運用史學方法，學者提出治史觀點，也有賴檢討及歸納前人成果，回顧與前瞻，由是史學通論、史學方法及史學史三者相連扣結。近年，旅居加拿大的臺灣學者王爾敏教授（為方便行文，以下略去尊稱「教授」或「先生」），先後出版十多本在臺灣已刊，並經王氏重新校訂或增補的著作，及多本在臺未刊的著述，如《近代經世小儒》、《今典釋詞》、《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及《新史學圈外史學》（後二書簡稱《非主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及《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王氏曾執教香港（1977-1989）、臺灣二地，培育不少史學人才，尤其是促進香港一地近代史及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如今，隨王氏著作於中國大陸刊行，將來大陸學界必然受王氏治史觀點及史學研究方法的影響，特別在2007及2010年出版的《非主流》及《圈外史學》中提出的治史觀點。王氏更言：「我刊布此書（按：《圈外史學》），已是鄙人在史學問題上的第三本書了」，這三本書分別是《非主流》、《圈外史學》，及先後由臺灣東華書局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史學方法》。《非主流》、《圈外史學》既為王氏近年的著作，也是作者檢討近現代史學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王氏總結過去實踐的治史經驗及觀察，在二書中提出很多有待開發的課題，對近現代史學有興趣的學人，自

可從中發掘新的研究題目。

二書為論文集，收錄文章的主要內容是：近現代中國史學史、史學研究方法、作者自傳及憶述。正因王氏終身任職於譽滿全球，研究近代史的重鎮——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師承「開拓近代史一門學術之宏大規模，更是炳炳烺烺，留下傳世之宏業」（《非主流》，頁 12）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又參與近史所自成立至壯大的重要發展階段，並於上世紀 70 年代末及 80 年代往香港任教，因此與中國大陸自文革平反後的國內學者交往，目睹國內學術界脫離馬列史觀治史規範，研究成果屢出的現象，故二書不獨為王氏自傳，也可見二戰後港臺史學的發展，更因作者身體力行，以研究成果引證提出的治史方法，這些治史的寶貴經驗，更應為後學所注意。

王氏在《非主流》說出成書的原因，為「自須先認清何者是主流，吾心目固自指有兩派：一為科學主義史學派，一為馬列主義史學派。並無第三派主流，卻有不少非主流」（《非主流·自序》，頁 1），《非主流》不獨是書名，也是名詞，泛指「主流」以外的史學發展及流派。因「非主流」史家未多為學者注意，轉眼間百年會自然埋沒，不存記錄，便無人知曉，故「呼籲學界高明之家，也起而速速研究 20 世紀之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作者在書中更認為：「主流一定是以洋為主，而要放棄以中國為主體」；換言之，「非主流」的史學不是科學主義史

派及馬列主義史學派，研究方法也不是「以洋為主」，故表揚「非主流」史家的地位，始撰此書。而《圈外史學》成書原因，主要是因梁啟超於 1902 年提出「新史學」後，近百年學界標榜新史學風尚，只求社會科學理論治史「爭持創新，抑舊習西，種種風氣，以至心若搖旗，飄擺不定」，自 90 年代後，大陸史學界與西方交往頻繁，必然傳入其代表「新史學」或「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可能出現史從論出之弊，作者著此書以便「奉勸大陸上史學界同道，決不可迷信理論，尤不可濫用理論，並不是天下理論俱好」（《非主流》，頁 viii），「非主流史學」或「圈外史學」均不是「爭持創新，抑舊習西」、不迷信理論，不濫用理論，而是一套堅實地從整理資料中，進行研究的治史方法，此已可見王氏名其研究史學的專著為「史學方法」，不言為「史學理論」之美意。以下便略述此二書的特點。

其一，二書擴闊近代史學研究領域。王氏指出「非主流」史學，不是科學主義史派及馬列主義史學派，研究方法也不是「以洋為主」。的確自梁啟超提出「新史學」後，掀起風潮，及在五卅運動後，學界奉批判傳統文化為代表新文化的圖像，至 1949 年後，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史學界，多受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多尚理論為科學治史方法，「科學主義史派」成為「主流」風尚。另一個「新史學」潮流，乃是 30 年代出現的馬列主義史學派，隨 1949 年後中國

大陸奉馬列史觀為「正統」，此派也成為「主流」。而曾批評這兩股「主流」的史家或不喜運用以上「主流」史家的觀點治史者，往往被視為「非主流」，「非主流」容易被忽視，王氏多次提醒後學要多注意「非主流」的史學及史家的價值。

王氏認為這些「非主流」的史家，為一群「抱道守器」專注埋首治學，自甘不隨波逐流，只求維持一時一地的治史風尚的學者，「主流派不是學問最高，而聲勢最大」，「非主流」的史家只為「勢蹙孤立，不是學問最低，而是聲勢最小」；況且「非主流」史家對臺灣及海外中國史學發展甚有貢獻，更應為學者多加注意。

作者更在《非主流·自序》及〈二十世紀之史學開拓與先驅史家〉中，提出「非主流史家」如劉師培及黃節為代表的等「國粹學派」，柳詒徵及徐則陵為代表的「南高」與「學衡派」的學者，雷海宗及林同濟為代表的「戰國策學派」，錢穆及孫國棟為代表的「新亞學派」，張其昀及宋晞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學派」，又有臺灣國民黨黨史會的羅家倫及李雲漢，列入「放眼江湖史學家」的李敖，香港史家簡又文、羅香林及饒宗頤，列入「海外孤忠」的周策縱、柳存仁及陳祚龍，作者尤特別提出要多注意由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以及所內研究人員組成的「南港學派」。撰成《非主流》一書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彰顯南港學派在學術上貢獻，俾後之學者得有查考線索，以

及評比同代之高下得失」（《非主流·前言》，頁1）。雖然尚可討論作者把以上學者歸入同一學派的觀點是否恰當，但王氏嘗試以「學派」觀點，規劃各學者的治史特色，尤應為今後研究人員所注意，如「新亞學派」及「歷史地理學派」均為王氏首先提倡。另外，王氏所列的史家，如宋晞、羅香林及簡又文等，至今學界也尚未有一本專著介紹這些學者的治史觀點。

其二，作者對個別史家評價，更見史識。《非主流》中專章討論郭廷以對中國近代史學的貢獻，文中談及郭氏治史重視年代學，古今通識融會貫通的治史觀點，最早提出中國近代化及中國與世變的問題，書中清楚概括郭氏治史觀點。還有，作者提及郭氏籌辦近史所，接受存藏外交部舊檔及經濟檔案，蒐集圖書，籌辦經費資助研究計劃，終成《中俄關係史料》、《教務檔》及《中國近代對西方及列強之認識資料彙編》，展開中外學術交流合作計劃，為亞洲協會編《清代夷務始末索引》，與華盛頓大學合作編纂《中俄關係史料》等，邀請所內年輕學人整理檔案資料，藉此培育青年學者治史方向及觀點。更由郭氏安排研究人員進行專題研究領域及中國區域現代化的課題，使研究員明白近代化的動向「不是為洋務而洋務，乃是真誠地為『自強』而『洋務』」，及「把『自強運動』命為『近代化』之肇端，屬於時代推衍的重大啟機」，強調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多注意自行改革，不盲從西方近代化的

理論，終成「以郭夫子建所為中心，以近代史為領域，以嚴謹治學為通式，以自由表達各展才華識斷為原則，以重大問題為對象，以歷史專論建立一家之言為宗旨，以代表一代學術風品為天職」的「南港學派」（《非主流》，頁 27）。經作者詳細的表述下，郭廷以不愧為「正是我們全體的領路老師，我們每人供是經其一手調教而成就學人」（《非主流》，頁 21）。

此外，書中也注意研究近代地緣政治學的沙學浚。近年國際政治學提出地緣政治的概念，作者從沙氏所處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及晚清民初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指出沙氏早於 1942 年結合中外史例，提出國家位置的保存是因為人文地理學的評估而確定之觀點。沙氏又提出三種首都類型為：海國、國都及中國之中樞區域，尤特別注意世界經濟類型、狹義的經濟空間、氣候為主經濟為輔的經濟空間等，不尚空談，結合史事，從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胡人南下牧馬，從兵學及農業發展的角度研究長城的意義，注意運河的盛衰與首都發展的關係，從政治及國防地理探討政權南渡與西遷的規劃，均可見沙氏「提出其精要評估，確足表現其歷史地理特識」（《非主流》，頁 69）。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沙夫子固未嘗明言歷史重演，我親承教誨，又專攻歷史，豈至不能明察他這種歷史重演之論述」（《圈外史學》，頁 124）。沙氏以歷代喪亂，國家嚴重殘毀的史事為演論重點，並述及北方強敵

入侵的原因，歸結：「中國歷史之不斷轉變，其推動力多來自北方」，更從世界局勢及歷史全局，以空間價值論點論述清帝西遷與國民政府因日本侵略而西遷等史事，說出：「中國面臨帝國主義之時代，其處境更是加倍危殆，中國勢須面對海上強敵」（《圈外史學》，頁 123）。又研究綠洲，倡導邊線及邊區的邊疆地理學，說明 20 世紀末，中國外敵來自日本和歐美的海外力量，及強大國家憑藉就是「海權世界」之觀點，並從亞洲空間價值看亞洲歷史發展，指出亞洲歷史動力的主角是「農業、游牧、海洋三種經濟型態的民族同等重要，並說明亞洲古文明，擴大亞洲文化的全球化，充實了亞洲歷史的內涵」（《非主流》，頁 82）。沙氏提出的要點均沿自其提出「歷史重演」之觀點，王氏總結沙氏的貢獻為：「由於地理學的獨立發展，即在同一時代之中，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亦產生重大擴張與改變，而有沙學浚先生在抗戰期間，另闢研究新途徑，開闢其地緣政治的研究方法」（《非主流》，頁 78），誠為允當之論！當然書中也介紹了禹貢學派、戰國策學派學者、張其昀和全漢昇等史地學者的觀點，這些課題或已有研究專著刊行，但仍有不少開拓的空間，如現時探討張氏及全氏的文章，多為追憶文字，少為研究二氏治史方法的文章。

王氏也探討張貴永、劉廣京、戴玄之、梁嘉彬、陸寶千、李國祁、唐德剛及「南

港學派」。書中介紹了張氏以「歷史的輔助科學」，比較西方赫爾德、陶恩培（湯恩比）、蘭克論西洋史學特色與張氏的異同，概括張氏「掌握最全，論析最精」（頁123），尤長於治西洋史及西洋史學。作者更以「經世思想大師」指稱劉廣京，指出劉氏已注意在19世紀，晚清知識分子面對西方衝，提出一套富強，兼具仁政同時並存的政策，補足昔日學界只注意這群知識分子提出富強的觀點，劉氏更開拓了近代新興企業的輪船航運、清代地方官吏及近代商人與工商企業的研究課題。書中也論及研究近代秘密宗教及秘密會社的戴玄之，尤突出戴氏於上世紀50年代，已研究清末義和團的性質及內涵，成功指出義和團與白蓮教無關，澄清了義和團組織的性質及特點，和指出近代秘密會社是「反清復明」（頁150）的性質，藉戴氏的成果以見「自是小民之史，亦具重大特色」（頁152）。至於王氏談述唐德剛的史學特色，除了指出唐氏帶動傳記文學的發展外，更談及近人多未注意唐氏也為外交史的專家，長於在列國紛爭中，闡明諸國關係，詳述「列國間之縱橫捭闔」（頁154），把唐氏與外交史專家蔣廷黻並列。至於談及梁嘉杉，也注意梁氏研治廣東十三行「取歷代通海淵源，史乘背景，研探精深」（頁159），「小題大做，深察全局」，考證十三行竹枝詞，治史求「小注詳備」的特點。至於論及作者的同事，尤稱美李國祁及陸寶千，王氏指出李國祁長於治

理檔案，可見李氏受德國史學重視史料的方法所影響，李氏長於近代外交史，明清地方中級官道員功能及演變，量化分析清代下級官吏府州縣官員，也開拓了晚清經世思想家、中國近代都市化、閩浙臺地區現代化、臺灣史的教研課題。至於陸寶千，則說明外界未知陸氏「以牟宗三門人自居」，指出陸氏長於闡述明末清初經世思想家的治國理念，清代公羊學家與漢代公羊家的淵源，晚清經世思想家的抱負，章太炎論儒學兼具兵俠二長之精義，歐陽竟無述儒學的特色，更努力搜集馬一浮遺著，作者奉陸氏為身體力行「今代醇儒，當之無愧」（《非主流》，頁183）。述「近代統計學派」的代表人物為王樹槐、李國祁、魏秀梅、張玉法、張朋園等，多為近史所研究人員，此派善於運用史料，以統計方法，堅實地支持論點。書中更指出近人忽視了郭廷以及其近史所學者的地位，作者把近史所學者列入「南港學派」，認為此派啟自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廷以治史重視年代學，重視通識及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更領導南港派學者研究方向，郭氏又重視剪報、刊佈國家檔案及專書、發行近代史集刊、舉行學術討論會及名人演講會，促進近史所的發展，尤以1959年近史所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的「口述史」計畫，更鞏固近史所的學術地位，書中更說明近史所開拓了十三個學術研究領域。王氏提出史家及史學流派，對後學甚多啟發，近年青年學者如香港的侯勵英對近史所展開研

究，臺灣的林志宏博士也研究郭廷以治近代史的觀點。

其三，《非主流》補足了研究當代史學的課題。研究當代史較困難的地方，為史事及身，尤以在世的人物，容易引起不同意見，主觀好惡亂其中。另一方面，若不以當代人的身份檢視當代人物，往往失去保存史料及文獻的作用，也未見一時的觀點，導致很多有意義的史事及觀點由是遺失。但作者以個人從事史學研究的豐富經驗，評論史學家尤具洞見，此二書不獨是王氏的自傳，也補足了近年研究臺灣史學發展的不足地方。近人雖注意臺灣史學發展，仍要多注意近史所在史學界的地位，王氏以自身經歷說明了郭廷以和近史所的成就，說明近史所學人的學脈淵源，為一般論當代史學者所未言及，王氏一文也可視為研究近史所發展的珍貴文獻。王氏在《非主流》及《圈外史學》二書中，論述雖多為作者的師友，卻均為當代史學界具代表的人物，這些史家也帶動臺灣史學的發展。如書中多篇文章提及創建近史所的郭廷以，既述郭氏上承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柳詒徵及中央大學羅家倫的治學特點，又與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合力創辦近史所，也接收外交部舊檔，促使近史所學人研讀及整理檔案，成果也出自整理檔案，終成中外學者重視的宏大巨著。王爾敏、李國祁、呂實強、張朋園、陳三井及蘇雲峰等均上承及擴大郭氏研究中國近代化延誤、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中國區域現代化的課題，故作者歸

結：「我們心中導師就是所長郭廷以夫子，他承擔所務之外，主要是領導研究方向，講論近代史上大問題，傳授研究方法，陶冶治學精神與提升水準」（《非主流》，頁25），更開啟近史所研究員多注意近代中國的總體重心在於中國本身對西方挑戰的回應，研究方式不求單一理論，並以設計問題為先，比較及統計方法為輔的治史風尚。

此外，書中表述郭氏延請了張貴永及陶振譽，擴闊研究人員的視野，尤以張貴永於1955年至65年間任職近史所研究員，講述「西洋外交史」的課題，開拓了李恩涵、王璽、林明德、張存武等人治中外關係史的研究課題。也因張氏多向學生介紹西洋德國蘭克、英國陶恩培的史學觀點及史學方法，此對李國祁、王樹槐及作者甚有影響。而王氏更談及外界尚未注意張氏實為領銜主編教務教案檔的人物，作者、呂實強及李恩涵「可以說是親承調教指導」（頁122），尤以李國祁更是「循張貴永之業師薰陶而特長於史學理論」，更重視整理及運用檔案（頁177），當然也不能忽視「國祁繼承夫子（郭廷以）之臺灣史，此其一長。國祁因受張貴永師調教，而繼承張夫子之史學，此其二長。與近代史研究所有深厚關係之劉廣京先生，生平最重經世思想，國祁亦加繼承，此其三長」（頁182）。書中又述及近史所同人治史方法的不同，如作者論張朋園研究的特色，為「運用統計宗旨手法與張玉法不同，在其研治近代議會政治史，特別把議會

中成員品質、出身家世背景，備為統計條目，而分析清末民初的諮議局，可以既切實又靈活」（頁 211）以議員為因子，以統計說明議會人事變動，判定議會的功能；張玉法則以社團為黨團演化的基本因子，以表譜統計說明清季革命團體與政治團體的演變。王氏更認為近史所研究同人為整理檔案，推動口述歷史，又召開多個學術研討會，如中國近代維新運動、辛亥革命、近代中國經世思想、清季自強運動等大型研討會，又編了多本學術價值甚高的論文集，更在自強運動、外交史、軍事史、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基督教史、區域現代化等研究領域多有創獲。經作者概括可知近史所推動臺灣及國際學界對近代史研究領域，貢獻甚大，故今後研究臺灣史學必要提及臺灣學者的近代中外史研究成果，而研究近代中外史的成果，必要談及近史所。

而且，王氏在〈二十世紀之史學開拓與先驅史家〉（《圈外史學》，頁 32-38）一文中，所列近當代 50 位史家，均是「一代大史家名單，不為任何一派，而是在『新史學』這個時代中，有深邃學養而重大貢獻之學者」，如評楊聯陞為「雖經濟名家，而其學問淵博，深熟古今之歷史掌故」；顧頡剛為「最重要之學術貢獻則在『尚書學』的建立」；鄧之誠為「本世紀通史大師」；其他如王獻唐、徐炳昶、史念海、周策縱等，對近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甚有貢獻。我們深信若日後研究者學能詳細研究王氏提出的史家

名單，將可以上承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後，另一本「當代中國史學」。

王氏在二書中提出的治史方法既可借鑒，也可見中國傳統史學在當代的價值。其一，勉勵學者要多研習史料。20 世紀末，國人深受西方現代化理論影響下治史，中國大陸早前已因強用馬列史觀治史，危害不少學術研究，近年國內學界又多受新文化史學理論所影響，不少著作多以史料遷就理論，而王氏面對此風，便說：「畢生服膺，重視史料，且獻身於史料之開拓，不遺餘力」（《圈外史學》，頁 54），總結治史經驗，批評依史學理論治史的不當，以史學理論治史只是一時流行，但從史料整理出觀點，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學人研究歷史，必須先自史料入手，必須認識史料，搜輯史料和運用史料」，史家為史料的主人，自能靈活及自信地提出觀點，他一再提醒學者要「全面通讀，達到精熟」史料（《圈外史學》，頁 62），並要詳細引入正文，考核正文，不可由作者總括代敘，杜絕曲解；史家也要負上編纂史料的工作；研究者研閱晚清文書時，要熟悉清代官文書體裁。其實，王氏不是反對社會科學理論，但是反對未能運用足夠資料而提出的理論，他說：「在信念上我絕不崇洋，也不放棄中國本位意識」，他肯定那些結合堅實資料提出觀點，如肯定了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郭沫若倡周人畏天重人，陳寅恪論關中本位，雷海宗的中國歷史兩周論，全漢昇研究運河與帝國關

係，蔣廷黻倡中國近代化一個歷史動向等，作者認為以上學者均是「出於個人卓識獨創，前無因襲，亦非抄自洋人，自足代表學術精華」（《圈外史學》，頁92）。

其二，王氏也批判傳統史學體裁及擴闊史學運用工具。一、王氏提醒讀者要多注意地方史料，因為地方史志為保存本鄉本土的資料，也為了解地方群體生活的依據，故學者應多注意方志學，而修方志者也應注意修纂省志、縣志、鄉鎮志的分別，今日鄉市鎮志最為缺略，學者或政府官員也應多注意撰修這方面的志書；二、史學上的表譜長於表現歷史中交錯關聯的內容，研究古代史學者也要多加研讀；三、學者要多注意掌故學，即注意一代的典制，這些資料就是取自正史書志、典制九通及政府功令；四、注意民間藏存大量俗淺鄙俚的資料，包括口傳資料，藉民間史料以見歲時節令慶典，民間信仰，民間休閒嬉戲遊樂活動，秘密社會史，小民生業知識技藝，地緣、商幫與祠祀，風月場所名媛等民間生活之課題；五、研究史學者也要具有古代經籍的常識；六、研究史學者要多運用古今人物的書信，從信中找到重要史料，王氏更認為箋牘史料「比奏議、條陳、詔諭、批牘、條約、規章、照會、說帖、稟啟、文移、公告等等，俱要看懂，而其中則蘊藏有極重要、極具關鍵史料」（《圈外史學》，頁358），並要了解箋牘形制，判析書信的隱晦影射文句，建構前人未知的史實。當然，更重要是勉勵後人治史

時，應多發揮史學鑒往知來的作用，「我所著《史學方法》重點之一是確定『歷史是推理的科學』，特別多次講述，入於拙著。我更肯定『鑒往知來』」。（《非主流》，頁72）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非主流》中也有錯別字及漏字的情況，如頁23，第十行，「野正高」應是「坂野正高」；頁234，第十六行，「科則是」應是「我則是」。同時，讀者若要進一步研究近史所的發展，可以多注意：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陶英惠《雪泥鴻爪——近代史工作者的回憶》、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載《世變中的史學》）及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至於介紹王爾敏學術成就的文章，也可參見梁家麟〈王爾敏師的生平與學術〉（載《王爾敏教授七十華誕暨榮休論文集》）、〈王爾敏教授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貢獻〉（載《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劉德美、宋秉仁〈王爾敏教授的史學功業〉及宋秉仁〈王爾敏教授著作編年〉（二文載《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高壽慶學術論文集》）。日後，讀者可以多翻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

史研究所專家訪談及回憶》與臺灣近史所出版關於近史所發展的專書，結合王氏對當代史學界的研究，既可見海峽兩岸兩個近史所的發展之異同，又能突出臺灣近史所的特色。

總之，《非主流》及《圈外史學》二書，不獨可見近代及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為研究當代中國史學的必要參考書，更提供很多有待開拓的研究課題。更重要的是，讀者也可把《非主流》、《圈外史學》及王氏的《史學方法》一起研讀，以見王氏提出不少史學方法，可供借鏡，我們深信此三書必可成為指導史學研究及史學通論的重要參考書。

新 書 介 紹



雲煙集： 余傳韜回憶錄

2014年11月出版
精裝（全2冊）600元

余傳韜為陳誠副總統之女婿，曾任中央大學校長，本書內容集中於傳主於北平淪陷前後、嘉義農專、中央大學及其父親等篇章的敘述，呈現傳主的求學生涯、工作歷程，以及回臺灣從任教育的始末與心得。

請洽國史館訂購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電話：02-23161067
網址：<http://www.drn.gov.tw>